

朱永嘉
—作品—

商鞅变法 与王莽改制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法和改制
在本质上都是为了
应对内外挑战而对自身的一种调节和改良

朱永嘉 著

商鞅变法 与王莽改制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法和改制

在本质上都是为了

应对内外挑战而对自身的一种调节和改良

朱永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 / 朱永嘉著. —北京 : 中国长安出版社 , 2018.5

ISBN 978-7-5107-1006-3

I . ①商 … II . ①朱 … III . ①商鞅变法 — 研究 ②王莽改制 — 研究
IV . ① K231.07 ② K23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7193 号

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

朱永嘉 著

选题策划 何崇吉
责任编辑 刘英雪
特约编辑 孙明新 李春博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apress@163.com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 (010)66529988 转 1319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3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书号 ISBN 978-7-5107-1006-3
定价 46.80 元

所有的成功和胜利背后，都有一个付出代价和阵痛的过程。商鞅变法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改革和变法也都是如此。

目 录

序：中国古代变法改制思想资源之历史回顾 01—09

上 篇 从商鞅到韩非——战国时代的改革

前 言：从商鞅变法说起的缘由	003
一、商鞅其人	005
二、《更法》与《画策》	008
三、《农战》	015
四、商鞅变法措施之一	022
五、商鞅变法措施之二	030
六、商鞅个人悲剧性的历史遭遇	040
七、变法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潮流	051

八、从韩非子说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潮	054
九、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比较	057
十、战国时期的儒家	061
十一、韩非子对儒家的批判——说《五蠹》	065
十二、从《定法》论法与术	070
十三、韩非子论势	081
十四、小结	087

下 篇 汉儒神学化和王莽改制的失败

前 言	091
一、汉代外戚辅政的历史传统是王莽起家的历史背景	092
二、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096
三、孝元皇后的起家及其如何为王莽上台铺平道路	107
四、王莽其人	112
五、王莽改制的思想资源	116
六、西汉儒学思想的演化	119
七、刘向、刘歆与古文学派的兴起	136
八、元、成、哀、平时期官僚机构的状况和变化	138
九、王莽的改制之一——关于土地制度的变革	143
十、王莽的改制之二——关于官制的改革	150
十一、王莽的改制之三——关于货币改制及其失败	159

十二、王莽统治崩溃的历史过程	181
十三、结束语	192
附：史记·商君列传	195

上 篇

从商鞅到韩非——战国时代的改革

所谓变法和改革，便是上上下下重新分蛋糕的事，弄不好打起架来，也很难说。触及人们的既得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所以领导变法的人要有承担风险的思想准备，要有迎难而上的精神，要有拼搏的精神才行。

前言：从商鞅变法说起的缘由

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运动在各国此起彼伏，代表变法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法家，法家最早的思想家是商鞅。那个时期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改革，是商鞅在秦国的改革，他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故商鞅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记得当年在上海上演话剧《商鞅》时，朱维铮是顾问，朱镕基在上海观剧时，还激动得为之流泪。改革的事不可能十全十美，有所得，必有所失，有付出当然会有牺牲，没有失败和牺牲的准备怎么行呢？1998年3月，朱镕基在两会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湖南代表团的讨论会上讲“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这些狠话，无非说明他有为改革牺牲个人的思想准备。商鞅为变法最终作出了牺牲，这也许是打动朱镕基的一个原因吧！商鞅的改革就是变法，从思想流派上讲，他不是儒家，是法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在晚年要我们标点

大字本时，便很关注与商鞅相关的代表作，他要我们为他标点注释了《商君书》中三篇文章：《更法》《画策》与《农战》，都是讲如何改革的问题。可见早在 1974 年 4 月间，毛泽东已对改革派商鞅变法非常重视了。《商君书·更法》及《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商鞅两句名言，其中一句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三代是指夏、商、周，五霸是指春秋时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意谓夏、商、周的礼制各有差异，五霸的法度各不相同，换一句话说是没有一成不变的礼制与法制，礼与法皆因时而有所变异。另一句名言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意谓国家的管理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只要便于国家管理，不一定要效法古代。所以在商鞅看来，“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尽其用”。意谓礼和法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制定，诏书和命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下达，各种武器配备都要适应便于使用的目的。商鞅这些话是他在秦孝公面前与保守派甘龙和杜挚辩论要不要变法时说的。商鞅讲的道理奠定了秦孝公实施变法的决心，商鞅变法便是从这一次庭前辩论开始的。

商鞅，姓公孙，名鞅，出身于卫国的贵族家庭，少年好刑名之学，商是他的封地。刑名，指法家的学说。《韩非子·二柄》：“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刑与形相通，名是指言。君王对臣子的考核，是考核他所言与所为之事是否相合。“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子·二柄》）法家强调所言与所为之事的关系，故后人称法家的学说为刑名之学。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申不害，司马迁在《史记》中便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司马迁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放在同一篇，实际上是把法家看作老子道家学说的一个支脉，“太史公曰”中说法家“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指法家的思想是由老子的《道德经》演化而来，叙述王者如何治天下，也就是如何管理国家的学说。关于道家的学说，《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之“道家类”，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

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其著录的道家学派有三十七家，著作九百九十三篇，《老子》即今之《道德经》五千言，其他大部分著作都散佚了。《老子》是保留下来了，1993年荆门郭店楚墓发现了竹简本《老子》。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同时出现的还有《经法》《十六经》《称》《原道》四篇，即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道家的学说流派很多，在战国到秦及汉初思想领域占支配地位。道家的基本观念是从哲学上总结成败存亡祸福的历史经验，目的是帮助统治者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在不同领域，道家可以分成不同的派别，如庄子是放者为之；法家是讲君人南面之术，如韩非子的作品；兵家是讲战略战术，如《孙子兵法》，这都是战国时期道家在不同领域的流变。在不同时期，道家的流变亦各有不同。从秦汉之际到汉初，是黄老之学占主导地位。《汉书·曹参传》记载：“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

魏惠王在位时，商鞅在魏相公叔手下做中庶子，公叔座知道商鞅有才能，曾向魏惠王推荐，魏惠王没有当一回事。公叔座去世以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秦国招贤纳士，想恢复秦穆公的霸业，于是由魏入秦，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于秦孝公。秦孝公，秦国嬴姓，名渠梁。秦孝公即位时只有二十一岁，秦孝公元年是

公元前361年，在位二十四年，终年不过四十五岁，古代王者长寿的人不多。秦孝公在即位的第一年，想到要变法图强而招贤纳士，与他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当时函谷关以东的六国——齐、楚、魏、燕、韩、赵并立而比较强大。秦僻处雍州，与秦国接壤的是楚国和魏国。秦在关中处于楚、魏之间，北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南之汉中、巴、黔中皆为楚所有。那时中原诸国把秦当作夷狄来看，不让它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孝公即位后之所以要发奋图强，一方面是由于外有列强相逼，另一方面是因国家内忧不断。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外环境逼迫下，秦孝公才下令招贤纳士，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秦孝公与商鞅见面。

改革和变法，都是统治者在相应的内外环境逼迫下，不得不发奋图强的。同时这也是一个不断奋斗，仁人义士为之付出代价和牺牲的过程。所有的成功和胜利背后，都有一个付出代价和阵痛的过程。商鞅变法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改革和变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一点认识，那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改革家了。现在改革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词语了，然而真正的变法改革并不如什么人都能说的口头语那么轻松啊！

二、《更法》与《画策》

《商君书》的三篇文章《更法》《画策》《农战》，集中体现了商鞅变法的基本观念，所以我们就从这三篇文章说起。

《更法》记载了商鞅在秦孝公面前与甘龙、杜挚二人辩论能不能变法、该不该变法的问题。这是一次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秦孝公提出来的，也是他主持的。为什么要开这次讨论会，是秦孝公考虑到当时“世事之变”，即战国中叶，秦与关东诸国相处形势发生变化。“讨正法之本”，商讨在这个形势下，应对这个变化可以采取的政策法令是什么；“求便民之道”，考虑如何动员民众的力量来应对面前的矛盾和问题。在会议开始的时候，秦孝公便提出想变法，也就是改变原来的法制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他说：“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社稷，是国家的代称，社是土神，稷是谷神，这里意为国家大事。秦献公去世，秦孝公即位，故称代立。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我”代替

秦献公即王位，理应不能忘记考虑当前国家的大事究竟是什么。这便是为君之道。“错法”，“错”通“措”，意为施行，是指如何推行法令；“务民主长”，这个“民”是“明”之讹。刘向《新序·善谋》引此句作“务明主长”，意谓推行法令必须阐明君主善良的意图，这是为人臣者应该做到的。“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此句意谓现在“我”想变法来治理国家，改革原来的法律制度，改革旧的礼制来教育和训练百姓，但是忧虑天下会不会因此而议论于“我”。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最早想变法图强的是秦孝公，让朝廷的三个大夫即公孙鞅、甘龙、杜挚一起来议论一下，看是否可行。这三个人中，公孙鞅是改革的激进派，甘龙与杜挚是保守派，不赞成更改已有的法度。

公孙鞅支持秦孝公要求变法的愿望，故他首先发言。这次发言的要点有二，一是：“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他首先消除秦孝公的疑虑，凡事不能犹豫不决，不可过多顾虑他人的议论。其实每一次改革都会有不同政见的议论，北宋王安石变法时，也是众说纷纭，那时流传过他的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即“三不足”说。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也重提过这“三不足”说，也就是不能因为不同意见的议论而犹豫不决。公孙鞅提到的要点之二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

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法令的设置是为了爱护民众，礼制的设置是为了便利行事，因此对圣人来说，如果能够使国家强盛，那就用不到按照老规矩办事；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沿用旧的礼制。公孙鞅这一番话是为了坚定秦孝公要求变法的决心，所以秦孝公称赞公孙鞅这一番话“善”，也就是好的意思。

甘龙提出异议，他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他认为依照秦国之故俗和既成的法制来管理，那么官吏们熟悉，民众也安心。

公孙鞅回答说：“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即认为甘龙说的是世俗人们的观念，一般人都安于故习，然而“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还说：“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即对那些拘于旧礼俗的人，不值得和他们讨论国家大事；受制于旧法的人，不值得与他们商量变法的事，认为秦孝公不应对变法的事有任何怀疑了。

杜挚又进一步提出异议，其云：“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他认为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法；器物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易，所以还是照老的办法做，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遵循大家习惯的礼俗，不至于出什么大的差错，所以请君王郑重考虑变法可